

蘇聯工業化初期的 糧食問題

許立羣著

中南人民出版社



蘇聯工業化初期的
糧食問題

許立羣著

中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漢口

書號：(中)0795

類別：〔甲——政治、法律〕

蘇聯工業化初期的糧食問題 (19,500字)

著 者 許 立 羣

出版者 中南人民出版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印刷者 精華鑄字印刷廠
(漢口前進五路2號)

本大印 20,000
定價 1,200元

一九五四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蘇聯在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期，在一九二八年，發生了穀物收購的危機。在糧食戰綫上所遭到的這一困難，帶給城市居民和紅軍以挨餓的威脅，並給剛開始不久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業帶來巨大的困難。

由於蘇聯共產黨和勞動羣衆極緊張的努力，糧食的危機在較短時間之內就初步渡過了。但直到農業集體化完成以後，糧食問題才在大體上獲得解決。

不能簡單地認為，蘇聯工業化初期的穀物收購的危機，只是在蘇聯的特殊的历史的、社會的條件下才會發生。造成蘇聯在一九二八年糧食危機的原因，並不是什麼偶然的事情。研究蘇聯糧食戰綫上發生緊張現象的原因和克服危機的經驗，自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穀物業危機的襲來

糧食的嚴重困難是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現的。自從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糧食就代替了餘糧收集制，國家收集糧食的方法，主要就是通過市場來採購（部分地採用預購

合同制)。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度，糧食市場發生緊張，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購糧計劃沒有完成，比起頭一年的一月一日，國家手中缺少了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約二十億公斤）的糧食。

革命前的俄國，糧食輸出曾佔輸出總值的百分之四十一以上（每年約輸出六至七億普特）。由於七年戰爭的破壞和影響，加上富農和投機商人的搗亂，在恢復國民經濟的初期，糧食問題曾感到嚴重的困難。加之，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有過嚴重的災荒，當時必須倚靠從外國輸入糧食。可是，糧食生產和國家購糧的情況，終究是逐漸好轉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國家已經能夠輸出四千萬普特穀物，以便換回恢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工業原料和運輸工具，並爭取對外貿易的平衡。一九二四年曾經計劃輸出兩億五千萬普特穀物^①。在一九二七年以前，連續三年的豐收，也帶來對糧食問題的樂觀的估計。當時曾經預計可以擴大糧食採購計劃，可以保證國家糧秣有五千萬普特以上的儲備^②。

在發現糧食的嚴重困難以前，國民經濟各個方面都顯得欣欣向榮。工業和農業的產量不僅達到而且超過了戰前水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增加到百分之四十

● 參閱「聯共（布）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決議」第一輯，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七頁。
● 參閱「聯共（布）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決議」第二輯，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頁。

二。社會主義工業的生產量在一九二七年的一年間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這是資本主義最先進國家的大工業也不能達到的速度。而且，一九二八年開始了爲社會主義建立經濟基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但是，購糧的危機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雖然當時蘇聯穀物生產量已接近戰前的水準（戰前穀物年產量是五十億普特，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是四十七億四千九百萬普特），可是商品糧食却只有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十七。在一九二八年春，由於購糧計劃遠未完成，糧食出口的計劃就被破壞了，由於沒有糧食輸出，棉花和亞麻就不能輸入，紡織部門由於缺少原料被迫停工減產。由於糧食供應不足或中斷，其它許多部門呈現了某種解體狀態。特別是輸出計劃的不能完成，就不能保證從資本主義國家換到必需的機器設備和原料，妨害了工業化的事業。這些困難一時曾有形成爲國民經濟全面的危機的威脅。

「聯共（布）黨史」指出，「毫無疑義的，讓穀物業所處的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那蘇聯的軍隊和城市居民就會陷於經常挨餓的境地。」「這曾是穀物業的危機，在這種危機後面一定會有畜牧業的危機跟着發生。」

爲了補救當時的危急狀況，迫不得已採用了臨時的「非常手段」，到一九二八年

三月底收集了二億七千五百萬普特糧食。可是從四月到六月，又沒有收到足夠的糧食，在青黃不接的條件下，又採用了非常的方法，伴隨而來的是許多過火行爲，即在收購區採用強迫命令的方法破壞革命法制，沒收餘糧，實行挨戶搜索，並且停閉部分的地方市場。採用這種軍事共產主義時代所採用過的辦法，並動用了農民留供自用的存糧，就給工農聯盟帶來新的威脅。

城鄉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商人和富農，利用這些缺點，造成恐慌心理，並破壞糧食的收集，更促進國內政治狀況的惡化●。

這些，就是糧食危機帶來的嚴重情況。

對商品穀物的需要量爲什麼迅速增長？

產生穀物收購危機的基本原因，並不簡單是設計工作不好，或者經濟計算工作中的錯誤。斯大林在「在糧食戰綫上」文中指出，「其實，這裏困難底原因是更深刻得多的。」●此外，設計工作的錯誤固然會對危機起相當大的作用，可是，在當時投機商人、富農和小生產者還大量存在的條件下，認爲計劃可以具有完備的調節作用，也是錯誤的。

什麼是斯大林指出的「更深刻得多的」原因呢？

這就是由於工業化的進展，商品糧食的需要量迅速增長起來，而穀物產量中運出

農村的商品部分增長極慢，甚至還有低落下去的危險。這樣，就使供求和購銷之間發生極大的矛盾。

商品糧食需要量為什麼會迅速增加呢？這是由於工業的增長，並帶來以下的情況：第一、工人數量增長着。這就一方面增加着對糧食的消費量，另一方面又減少着農業的勞動人口。而且，工人的生活水準一般比農民要高些。

第二、城市人口增長着。當時蘇聯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四（全蘇聯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二點三）。城市人口是不生產糧食，而是要消費糧食的。

第三、技術作物（棉、麻、糖蘿蔔等）的種植區在增長着。一九二八年技術作物的種植面積已超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五十八點五，產量達到九億零一百萬盧布。這些新出現的技術作物區域，不僅不再出產穀物，反而需要糧食的供應。

此外，當時爲了換取必要的工業設備和原料，必須輸出部分的商品糧食。食品工

● 參閱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問題」（摘錄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列寧格勒黨部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聯共（布）中央七月擴大會議的總結」）。「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冊，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九〇頁。

● 斯大林：「在糧食戰線上」（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談話摘錄），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頁。

業的發展，需要增加穀物的供應。國家擔負了中小城市的糧食供給，也增加了對商品糧食的需要。

對商品糧食需要量的迅速增長，從以下事實中清楚地表現出來，即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三個年度，由國家收購和控制的糧食並不見得少一些；而且，除去出口糧食以外留供國內需要的糧食量也逐年增加^①，可是，商品糧食還是不敷需要，還是發生了嚴重的危機。

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糧食危機並不是經濟停滯或衰落過程中的困難，它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是發展中的困難。

● 根據斯大林「在糧食戰綫上」文中的材料製成下表（單位：百萬普特）

年	度	採辦額	輸出額	留供國內需要的商品糧
一九二五——二六	（截至四月一日止）	四三四	一二三	三一—
一九二六——二七	（截至四月一日止）	五九六	一五三	四四三
一九二七——二八	（截至四月一日止）	五七六	二七	五四九

可見留供國內需要的商品糧是在逐年增加的。

商品糧食的增長爲什麼極慢？

商品糧食增長的速度爲什麼極慢，甚至還有繼續低落下去的危險呢？

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農業結構由巨大商品經濟變爲半自給的小農經濟。「聯共（布）黨史」第十章曾經指出：「一九一八年開始在農村中發生的那種由巨大商品經濟單位碎裂爲細小經濟單位，再由細小經濟單位碎裂爲極小經濟單位的過程，仍然繼續着，細小和極小農民經濟變成爲半自給的經濟，只能出產最低限度的商品穀物，一九二七年時期穀物業所出產的穀物，雖然只稍微少於戰前穀物業所出產的數量，但當時穀物業所能出賣給城市的穀物，却只稍微多於戰前穀物業所能出賣的數量三分之一。」

這就是說，革命後的俄國，農業結構已經由巨大的商品經濟（地主富農的經濟）佔優勢過渡到以小農經濟佔優勢了。而小農經濟，不能進行合理的經營，不能採用農業機器，不能採用化學肥料，不能推行正確的輪種制度。當時一般的小農經濟多半不能實行逐年擴大的再生產，多半只能經常實行簡單的再生產。因此，小農經濟是「半消費性的經濟」，是只能出產很少商品糧食的經濟。斯大林曾經指出說，「小農經濟

究竟是什麼？他只有很少的商品經濟，很小的收入，而有比較多的自然經濟，只有百分之十二或十三作為商品。」^①加上革命勝利以後，農民生活的改善增加了糧食的消費。所以，商品糧食大量減少了。

這種由大經濟到小農經濟的轉變，可以從農戶數目和穀物產量中看到。從農戶數目說，戰前約有一千五、六百萬農戶，一九二八年却有二千四、五百萬農戶。從穀物產量說，中貧農由戰前生產穀物總量的半數，上升到生產糧食總量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三；富農的穀物產量戰後只及戰前的三分之一（從十九億普特降為六億普特）；地主經濟則完全消滅了（原產六億普特）。所以，絕大部分的糧食生產，已由地主富農方面轉移到貧農中農方面來了。這種農業結構的分散過程，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變化。由於農業稅累進的原則，這種分散的趨勢還繼續有些發展。

各種農業結構的商品率，戰前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比較如下表（根據斯大林「在糧食戰綫上」統計表改編）：

戰前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富農 中農和貧農	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 富農 中農和貧農
商品穀物在穀物總產量中的比重	四七・〇 三四・〇 一四・七 二六・〇	四七・二 二〇・〇 一一・二 一三・〇

從表中可以看出，地主、富農、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這些巨大的經濟單位，商品率比小農經濟單位要高出許多。這是由於大農莊可能利用機器，採用化學肥料，不斷地提高產量，所以能夠賣出大量商品糧食；而小農經濟却沒有這種可能性。

據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統計說明：當時能夠提供大量商品糧食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數量還很少，糧食出產量只佔全國總產量的百分之一點七，只及富農糧食產量的八分之一，比起個體農民來更少得多，因而不能改變事情的面貌。

斯大林把以上這種糧食危機的基本原因，歸結為：農村經濟不僅比工業一般的落後，而且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過度的落後。正是由於這種過度的落後，農村經濟的問題，特別是穀物問題才在舞台上出現①。

第二個重要的原因，是富農對購糧政策的反抗。從一九二七年起，富農對糧食採

●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問題」。「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冊，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八七頁。

● 參閱斯大林：「論國家工業化與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頁。

辦的態度有了顯然的變化，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富農自流式地把糧食賣給國家，而這以後就不再自流式地交出糧食。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富農生產六億普特糧食，運售出來的商品糧食是一億三千萬普特。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富農在一九二七年以來態度的變化，主要是由於三年的豐收使他們的力量壯大起來了，他們積蓄了必要的資本，就囤積不賣，只把肉類、燕麥、大麥和其它一些次要農產品運到市場上週轉週轉。關於這種變化，斯大林指出說：

變遷就在於富農和股實分子在這幾年內已長大起來，幾次豐年對於他們不是白白地過去了的，他們在經濟方面已強固起來，他們已積蓄起某些資本，因此他們現在已能在市場上玩弄手腕，把自己的剩餘糧食囤積起來等待高價，而拿其它農產品來週轉週轉。糧食不是平常商品。糧食與棉花不同，棉花是不能吃的，是不能見人就賣出的。在我們現今條件下，糧食與棉花不同處，就在於糧食是大家都買，沒有它便不能生存的一種商品。富農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把糧食囤積起來，使一般糧食所有人都沾染這種風氣。富農知道糧食是寶中之寶。富農知道剩餘糧食不僅是他們發財的手段，而且是用來盤剝貧農的手段。現在富農手裏的剩餘糧食，是在經濟上政治上加強富農分子勢力的手段，……●

第三個原因，其他特殊的因素和領導工作中的缺點。首先，一九二八年烏克蘭和北高加索一部分地區冬禾被霜凍死，而烏克蘭同一地區夏季又遭到了旱災，使穀物減

產三億普特。其次，由於農村收入特別是富農收入增加，農村對工業品的需要量也迅速增長，市場的平衡遭到了破壞；商品供應計劃不正確、不及時；糧食價格沒有比照其它農產品的價格做適當的提高，不能刺激出售餘糧的興趣；稅收的錯誤（對富裕農民稅輕）；糧食消費的不當；購糧機關、合作社和黨政組織上的缺點（本位主義、步調不一致，缺乏積極性和任其自流）；挨戶搜索、組織攔阻隊、部分停閉地方市場，加上富農投機商人的破壞，就造成了糧食市場的緊張和恐慌。

農業集體化是解決穀物問題的根本出路

一九二八年的糧食危機，經過緊張的努力，到了年底時，國家已經擁有充分後備的糧食。到了第二年，情況繼續有所改善。蘇聯共產黨中央在「關於一九二九——三〇年國民經濟控制數字」的決議中對穀物業危機的克服是這樣敘述的：

播種面積、農業總產量及商品糧產量的增加，定購合同的加多，農業社會化部分在商品糧產量中所佔比重的增高，所有黨的、蘇維埃的及合作社機關在糧食採購工作方面的緊張努力，為徹底完成計劃及克服富農的抵抗與怠工而進行鬥爭

●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冊，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五頁。

的貧、中農組織的加強，對糧食投機及富農隱藏餘糧行為鎮壓的加強，以及對農村工業品供應狀況的改善，所有這些，都保證了糧食採購工作的順利進行，使之大大超過了過去數年來糧食採購的成績，並使我們有可能在今年建立起將近一億普特的糧食儲備。●

這裏總結了糧食問題大體上順利解決的經過。自然，這只是糧食問題的初步的解決。關於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蘇聯共產黨曾經根據列寧遺留的指示，認定唯一的出路就是聯合小農戶組成能够運用拖拉機和其它現代化農業機器的、集體勞動的社會主義大農莊。

當穀物業危機發生時，斯大林就在「在糧食戰綫上」的講演中，指出克服當時危機的三條出路，這就是：（一）把落後的散漫的小農場聯合爲大規模的公共農莊，由個體的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經濟。（二）擴大和鞏固原有的國營農場，組織和發展新的巨大的國營農場。（三）一貫提高小農和中農個體經濟的收成率。

斯大林在「在糧食戰綫上」和其它論文中指出：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定加強集體農莊運動，乃是提高糧食商品額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根據當時的實

●「關於一九二九——三〇年國民經濟控制數字」。「聯共（布）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決議」第二輯，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八七頁。

踐證明，集體農莊不僅產量大，而且可以提供百分之三十的糧產額作為商品出售。此外，還要擴大和鞏固原有的國營農場，組織和發展新的巨大的國營農場（它曾被稱為大規模的「穀物工廠」）。當時的實踐證明，國營農場的糧食商品額，可以高達百分之六十五。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設立國營農場和聯合小農經濟成為大的集體農莊，是「解決一般鄉村經濟問題尤其是五穀問題唯一的方法」。「自從第十五次大會以後，尤其是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現了糧食的嚴重困難之後，黨就在日常實際工作中跑上了這條道路。」●

蘇聯共產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中央政治局先後通過了擴大和鞏固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網的計劃。一九二八年四月蘇聯共產黨中央關於組織國營農場的決議，規定要使這些農場能够在三四年後生產出一億普特商品糧食。國家成立了「五穀托拉斯」來執行這一決議，組織了國營農場總局來加強國營農場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蘇聯共產黨中央通過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幫助集體農莊的決議。國家為社會化的農業撥出大量撥款，供應它們大量的拖拉機，開墾了大批未開墾的荒地，使社會化的農業

● 斯大林：「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發展和蘇聯底內部情形」（摘錄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結論」）。「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冊，一九五一年人民出版社，第四二七頁。

耕種面積猛烈地擴大。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穀物產量，已經達到四億普特。雖然這一產量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經濟的總產量還少兩億普特，可是商品糧已經達到一億三千萬普特以上，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商品糧還要多一些。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底曾經預計，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穀物產量將達到九億普特，商品穀物將達到四億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商品穀物多得不可比擬了（而實際上，到一九三〇年六月，斯大林已經指出，單是集體農莊已可出產穀物十五億五千萬普特，其中商品糧達到五億普特以上）。正是由於這一變動，所以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底宣佈：「現在我們已具備有物質基礎來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代替富農生產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近來已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了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這些，就是實踐了斯大林所指出的，要逃出穀物危機，不是倚靠把工業發展的速度降低到穀物經濟發展速度的水平（這是向後倒退），而是「使穀物業底發展趕上工業發展底速度，並且把穀物業底發展速度提高到能够保證全部國民經濟、工業與農業迅速向前發展的水平」●。

● 斯大林：「論蘇聯土地政策底幾個問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頁。

● 斯大林：「論國家工業化與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頁。